



土司文化研究(“土司学”建构)

主持人语

土司研究正不断深入,构建土司学再次成为热点。为此,《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参与组织召开了“土司学高层论坛”,并决定开展土司学的专题讨论。本期发表的四篇文章,集中反映了参加论坛者的观点。

马大正《论深化土司问题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指出,研究土司制度一定要有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视野,要有历代边疆治理的大视野。同时强调,构建土司学,要重视开展土司学构建理论的研究,要关注土司研究社会基本功能的发挥,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的撰写。李世愉《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论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一文,首先对土司学的定义做了阐述,认为它是以土司制度推行运作的历史为背景,进而研究与之相关内容的一门专学。同时指出,任何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称“学”,其研究状况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土司研究一百年的演进历程和当前的发展趋势表明:土司研究从个案研究和区域性研究转向全方位的研究,从单一学科的研究向多学科渗透,从实证研究向理论建构提升,标志着土司研究正在走向成熟,土司学的提出和构建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势。李治亭《论“土司学”的独特性》指出,没有独特性的研究领域是无法称“学”的。土司学的独特性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土司制度推行600余年,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西南地区的发展史,土司制度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它与同时共存的府州县制迥然有别,与其他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差异明显,土官与流官更是泾渭分明。现存诸多土司文化遗产是土司制度独特性的展示。成臻铭《“土司学”的提出与推进》考察与评估了“土司学”的提出以及推进的进度与力度,认为“土司学”作为专门学科概念提出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鉴于“土司学”学科理论的构建存在明显不足因而建议,要在加强土司学学科理论的构建上多下工夫,以取得土司学学科建设的突破。这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必要性、迫切性及可操作性。这只是讨论的开始,况且四篇文章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涉及土司学的问题还很多,如土司学的学科定位、内涵与外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都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真诚欢迎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土司学的构建添砖加瓦,做出贡献。

主持人简介:李世愉,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DOI:10.13438/j.cnki.jdx.2017.04.001

论深化土司问题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

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土司问题研究正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构建土司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前土司问题研究应强调历史大视野,因为土司制度的推行、改土归流的实施都是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存在。同时,研究土司制度也要有历代边疆治理的大视野,毕竟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治



理模式。土司问题研究也要力戒泛化,要努力追求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土司学构建的进程。另外,要重视开展土司学构建的理论研究,要注意土司研究社会基本功能的发挥,而尽快组织力量,广泛调研,集思广益,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的研究与撰写则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土司学的构建,并不是土司问题研究的终结,而是一个新起点。

关键词:土司研究;土司学

在线杂志: <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 K207; K28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7)04-0001-05

作者简介: 马大正,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引用本文: 马大正. 论深化土司问题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8(4): 1-5.

我是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关注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近些年来,我以中国历代边疆研究为出发点,以这样一种历史视野始终关注并参与着土司问题的研究。

中国土司问题的研究与边疆学的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的研究对象、路径选择、价值取向、史鉴考量乃至社会响应,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从研究史的角度看,两者的发展路径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评点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两者都具有某种“标本”的意义。边疆问题研究早著先机,从一籍籍无名、被边缘化的“冷门”,发展成为学界公认的“显学”——边疆学;土司问题研究也步其后尘,正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当前学界同人致力于构建的土司学,意欲为土司研究水平的提升打造一个新的平台。土司问题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将指日可待。

正是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量,近十年来,我在关注和观察的同时,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2011年以来,我参加了各种类型的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讨会,并提交和发表了如下文章:《深化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①、《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前瞻》^②、《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③。这些文章,表达了个人对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的一些观点和见解,更思考着这一研究的走向和创新。

本文的写作,可以看作是这种关注和思考的一个归纳。以下拟就土司制度研究和土司学构建提出三点看法。

一、土司问题研究应有历史大视野

研究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必须依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视野。

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消亡,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演进的。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是由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国情所决定的,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了一个漫长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的。从先秦时期开始,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了一个核心区域,这个区域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它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又是一个国族的概念。多元是指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色,也就是各民族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所具有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是指各民族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的趋势。这种由多元到一体的特点,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这两大历史遗产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而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都是在上述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存在。

① 该文曾提交“第一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刊发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并收入徐俊主编《土司研究新论——多重视野下的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民族出版社,2014年。

② 该文曾提交“第五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刊发于洪涛主编《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新论——第五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③ 见拙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第十章:“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研究”所设专题“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该文从综论、土司制度演变研究、清代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三个方面,对建国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了综述与评议。

研究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要有历代边疆治理的大视野。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进程中形成的一种统治模式,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他们实现对各族人民的管理,达到加强边疆地区治理的目的。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治边“因俗而治”的思想。以有清一代土司制度演进历程观之,从清初沿袭明代土司制度,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正是清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逐步加强的过程。因此,土司制度在历代治边政策中,特别是有清一代治边政策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轻视的。

从史学功能而言,土司问题研究原本就是因“时政”的需要而引发的。它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决定了这一研究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使命感。这也是今天拓展土司研究历史视野的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言之,土司作为一种体制和文化,其研究创新,与国家认同与统一、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乃至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大业,都有着重要的史鉴意义,理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成为我们从事土司问题研究的指向。

二、土司问题研究要力戒泛化,着力深化和创新

力戒泛化是我们从事土司问题研究应有的科学态度。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始于元,盛于明,衰于清。其盛行的地域分布桂、滇、黔、川、湘、鄂、甘、青等省区。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它形成于元代,元政府第一次在西南地区实行了“蒙夷参治”之法,使地方官更有“流”“土”之分,这就是土司制度的最初形成。明朝政府出于对巩固边疆地区的要求,制定了一整套有关土司承袭、贡赋、征调、奖惩的制度,使土司制度得以完备。清初统治者因袭明制,保留了土司制度,直到雍正年间,清政府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废除了大批土司而代之以流官的统治,使内地的行政制度得以在西南边疆地区实施。由此可见,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内的特殊产物,这已成为当今学界认知的主流,但在研究中仍要防止将土司制度泛化的倾向。

所谓泛化,一是指研究中在时间上超越元、明、

清三代,将秦汉以来历朝统治者推行的羁縻政策统统归入土司制度下;二是指在空间上将蒙古的扎萨克制、东北边疆的羁縻卫所制度,清代维吾尔人社会的伯克制等都划入土司制度范畴。对此,已有学人做了很好的探研。罗中、罗维庆《共识缺失:土司制度研究泛化的成因》指出:土司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本地性“立蛮首、领蛮地、治蛮民”的治理方式而体现出来的自治权;土司制度实施的主要地域是我国的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与扎萨克制度、羁縻卫所制度、僧官制度、土屯制度有根本性的区别,不能归纳为同一种制度^{[1]45-56}。以上见解,愚以为诚是!

力戒泛化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追求是深化和创新。

土司问题研究要在不断丰富资料发掘、整理基础上,着力于研究的深化和创新。课题设计要着眼于有利学科建设的推动,着力于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的深入,开拓对历史上土司社会的全方位探研;同时对刚起步的我国现存一百余处土司遗址的发掘、保护、管理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要做出科学论研,有序推进。我期盼已经着手多年的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文献资料发掘、整理早日结项并出版。我也十分赞成组织力量启动“中国土司制度通史”、“中国土司大辞典”、“土司印信图录”、“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地图集”等重大研究课题。在研究方法上应坚持三个有机结合,即从研究对象言,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从研究类型的分类言,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从研究方法言,是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整合。这样才能将土司问题研究一步步深化,并将创新落到实处。

三、要加快推动土司学构建的进程

2013年1月15日,李世愉先生在为《土司研究新论——多重视野下的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一书所撰序言中明确提出:“土司问题不仅是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多地区、多民族关注的历史现象。由于受到学科和地区的限制,以往对土司制度缺乏整体性的研究,而各学科(如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的研究之间又缺乏沟通和了解,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指出随着“土司文化”概念已得到广泛认同,“土司学的构建也在孕育之中”^{[2]序}。在这里,作为中国土司制度研究领军人物的李世愉先生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土

司学的构建。

我认为,作为国家招标课题“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李世愉所表达的不但是个人的一种自信和追求,更表达了学界同人的心声,因而在学人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的确,我们不但要构建土司学,而且坚信这个目标一定能实现,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学术自信。如果说,在这一课题启动的2013年,土司问题研究方兴未艾,那么在课题行将完成之际,这一研究已然是“而立之年”了。据了解,这一课题的终端产品,其体量大超过原有设计目标,五大类资料将达到上千万字。其中分量最大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土司档案,绝大多数是未曾公开发表过的,对这些档案所作的电子化处理,更是档案利用的一种创新。这些资料的问世,必将大大促进土司课题的研究,成为土司学构建的重要保证。

随着土司研究纵深拓展和水平的提升,关于土司学构建的思考和讨论日趋热烈,土司学的构建已然提到史学界的议事日程上来。

下面,就土司学的构建提出几点看法,以相切磋。

第一,土司学的界定。我们所说的土司学,当然不能与生物学、历史学之类学科等量齐观。但既然称之为“学”,作为一门专学,就应予以定义,对它的学术指向和范围作出界定,就像我们所熟知的敦煌学、红学,乃至徽学、科举学一样,它们的研究对象必须有着科学的界定。简而言之,我认为土司学应该是这样一门学问:它是研究中国土司历史存续期间相关制度及由此派生和相关联的土司文化、土司社会的一切历史现象及其兴衰规律的科学。

第二,百年土司研究已逐渐形成土司史、土司志与土司文化研究传统,以及历史与现实相关性研究的态势,为构建土司学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三,历史学是土司学的学科依托。基于土司文化、土司社会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多样性特色,研究中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诸学科间互通和集约成为必要,土司学需交汇的学科至少包括了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考古学等等。

第四,地方志、乡土志、土司文物遗存、遗址保护是土司学的重要内容,应集众人之力推动土司制度知识的普及。学者不仅应提供有关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社会、土司现象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还应努力参与各种形式的中国土司制度、

土司文化、土司社会的知识普及和土司遗址、遗存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不能仅仅满足于“阳春白雪”,孤芳自赏,故步自封,应该跳出象牙塔,以满腔热情参与并推动知识性普及读物的撰写,以强化土司学的社会功能。

土司学构建除了必要性和必然性外,还必须具有可操作性。现阶段,就土司学构建的具体运作而言,以下五端应予重视,并组织力量予以落实。

一是开展土司学构建的理论研究。其中重要命题至少有土司研究的历史积累和当代进展,土司学的学科定位、内涵与外延、研究对象、主题与重点、方法与功能、学科生命力等。

二是要注意土司研究社会基本功能的发挥。土司研究基本功能可归纳为文化积累功能和资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具体说,首先是描述功能,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任何一项研究的基础;其次是解释功能,着重在说明“是什么”的基础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再次是教育功能,从国家边疆治理大视野出发研究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着眼当代边疆治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由此,则资政育民的重任显而易见。

三是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暂名)的撰写。应创造条件、积累资料、组织力量、广泛调研、集思广益,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的研究与撰写。该项目应具有理论的创新性、研究的开拓性、学科建设的基础性,要阐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从土司研究升华到土司学的必备条件和在当今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中的定位;既要回答“土司学”是什么,也要落实“怎么建”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并将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视之为土司学构建工作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四是在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大培养土司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此举不仅是为土司学构建和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更是土司学为了扩大社会影响面和认知度的一项重要举措。

五是从机构和规划的配置方面,促进土司问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近些年来,土司问题的研究得到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国家社科基金近几年发布的课题指南中,都列有关于土司研究的课题。如2017年就发布了“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与开辟苗疆比较研究”、“明清西南地区开发研究”,相关的课题还有“历代边疆治理与族群认同研究”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7年课题指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学术研究导向作用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课题指南的上述配置,必定会促进土司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近些年来,相关院校和机构还成立了土司研究基地或中心,并制定土司历史文化研究的计划。如吉首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制定了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土司文化研究规划,并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合作,准备出版《中国土司文化研究丛书》;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土司文化研究中心将陆续出版《土司文化研究丛书》;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支持的湖南永顺县中国土司文化研究中心、广西忻城县中国土司文化研究基地等单位,为配合土司遗址的保护利用,也制定了相应的研究、宣传和出版计划。上述规划和目标是土司研究可持续发展和提升整体研究水平的有力保证。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全国一盘棋”方针的指导下,加强学者和机构之间的交流沟通,统筹协调和分工协作。

历史长河奔腾向前,人类对自身的认知和研究

永无止境。土司学的构建并不是土司问题研究的终结,而是新的起点。要重视历史研究,要强调以史为鉴。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为历史学营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振奋的学术氛围。我们应该全身心地投入,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一步一个脚印,如古人所云“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理想之彼岸——土司问题的研究必将成为一门显学,正在孕育中的“土司学”,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实至名归。我们坚信,必将成为历史学界重大节日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参考文献:

- [1] 李朝晖,李世愉.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论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2] 游俊.土司研究新论——多重视野下的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陈伟)

On Strengthening Tusi Researc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y of Tusi

MA Dazheng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rontier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usi is becoming a hot issue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y of Tusi is being put on the agenda. Presently, the research on Tusi issues should be based on a wide historical vision, because the practice of Tusi system and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as historical phenomenon and historical existence, is under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on Tusi system, an administrative model in the frontier regions during the Yuan (1206—1368), Ming (1368—1644), and Qing (1316—1912) dynasties, should also be based on a wide historical vision, emphasizing deepen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mong the lot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works to be done in constructing the study of Tusi, compil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usi is the most urg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y of Tusi should not be the end in the research on Tusi issues; instead, it should be a new start.

Key words: research on Tusi; the study of Tusi